

書 評

毛 文 芳*

Jamie Greenbaum

Chen Jiru (1558-1639): The Background to,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Uses of Literary Personae

Leiden: Brill, 2007 (Volume 81 in the Series Sinica Leidensia), 43+292 pages, ISBN 978-90-04-16358-4

青史流芳者何其多！沈德符曾就物品與人名相繫流傳於世之現象論曰：

古來用物，至今猶繫其人者，……無如蘇子瞻、秦會之二人爲著，如……東坡椅；……東坡肉；……東坡巾；……太師椅；……太師榻，皆至今用之稱之。近日友人陳眉公作花布花緞綾被，及餅餌、胡牀、渡器等物，亦以其字冠之，蓋亦時尚使然。（《萬曆野獲編》卷26〈玩具〉）

某些物品與庶民世俗生活緊密相連又傳誦廣遠，沈氏以物質的角度爲流行文化提出敏銳觀察，認爲這些模仿名人以追求品味的行爲，是「時尚使然」。李漁亦曾針對大眾文化的非理性戲論曰：

食以人傳者，東坡肉是也。卒急聽之，似非豕之肉，而爲東坡之肉矣。噫，東坡何罪，而割其肉，以實千古饞人之腹哉？甚矣，名士不可爲，而

收稿日期：2009年3月25日，通過刊登日期：2009年10月21日。

* 作者係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Mao Wen-f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, Chiayi.

名士遊戲之小術，尤不可不慎也。至數百載而下，糕、布等物，又以眉公得名。取眉公糕、眉公布之名，以較東坡肉三字，似覺彼善於此矣。而其最不幸者，則有溷廁中之一物，俗人呼爲眉公馬桶。噫！馬桶何物，而可冠以雅人高士之名乎？（《閒情偶寄》〈飲饌部，肉食第三〉「豬」）

利用語言的歧義性將東坡嗜食的五花肉簡化爲「東坡肉」一詞，使千古風流文士與市井庖物產生不協調的俗趣，李漁稱爲名士的遊戲小術。那麼害死忠良岳飛的宋相秦檜，被送入油鍋製成「油炸檜」，咬牙切齒的咀嚼動作落實了庶民爲忠懲奸的復仇意欲。李漁調侃著躍爲晚明大眾文化的新寵陳繼儒（號眉公，1558-1639），若與五花肉連結的東坡才子相較，糕、布甚至是馬桶繫聯的陳眉公，時名可謂不遑多讓。

以大眾文化視角考察晚明文人陳繼儒，最近一部漢學力作：Jamie Greenbaum, *Chen Jiru (1558-1639): The Background to,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Uses of Literary Personae*，有精彩的闡論。政經社會皆已產生巨變之際，陳繼儒是一位靈活周旋於仕／隱／商等場域的文士，作者引清代蔣士銓《臨川夢》〈隱奸〉出場詩：「翩然一隻雲間鶴，飛去飛來宰相衙」，認爲再沒有比「雲間鶴」這個意象更適合用來作爲一個前現代中國文士的隱喻，擺盪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諸多面向的陳繼儒，正是這個飽含讚美、質疑與嘲諷的意象源頭。Jamie Greenbaum 之大作奠基於其 2003 年的博士論著，經年修訂而成，作者得益於西方文學批評家對於 Shakespeare、Charles Dickens 或屈原等中外文學家的重新審視，對頭緒紛紜的評論作脈絡清晰的鋪陳與剖析，以達致陳繼儒「再發現」的任務。本書包含陳氏傳記細節性的研究、陳氏文學書寫的社會效應，以及四百年來的陳氏接受史。書共九章，一至四章處理陳氏略歷，五、六兩章處理陳氏兩種不同的書寫性格與文學市場，後三章涵蓋晚明迄今陳氏聲譽與著作所衍生的種種形貌。

本書出版後次年，Allan H. Barr 曾發表一篇書評（參見 *Ming Studies*, no. 58, Fall, 2008, pp. 72-78），文中肯定 Jamie Greenbaum 在以遠距離審視陳繼儒生涯與著作的優勢觀點上，提供了一個富有同理共感的閱讀。此外，該文幾乎完全負面地舉出該書的疏漏與錯誤，大抵歸結於對史料文獻解釋的不足、偏斜、任意與矛盾所致，包括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、朱彝尊《明詩綜》、尤侗《艮齋雜說》……等涉及陳繼儒的相關論說，因爲解釋不當而造成

多處論述武斷的現象。舉例而言，Greenbaum費盡周章地為朱彝尊《明詩綜》中陳氏只重個人名聲而忽略家國傾危的形象辯析，Barr認為作者似乎用錯精力，朱氏或尤侗等人並不真正責難陳氏忽略的家國意識，而在陳氏過分沈醉於晚明日漸膨脹的自我名聲，其雖成為引領社會品味的仲裁者，卻並無足夠的成就去符應這種喝采（p. 75）。另外，Barr對於Greenbaum視陳繼儒為《牡丹亭》劇中塾師角色陳最良的典型則比附不當，甚至失去常識性判斷（pp. 76-77），又對陳氏作品《寶顏堂秘笈》的編集說法前後不一致（p. 77）。Barr的負面意見還擴及Greenbaum參考文獻引用的正當性與否，如漏引現代學者John Meskill、吳承學、周明初的重要著作，卻牽合Craig Clunas的觀點於陳氏傳記「陳子曰」的體例解釋中。作為一位精密的讀者，Barr在註腳中慧眼辨出語法彆扭與錯誤的文句（p. 178，註27），又不滿於書名副標題的句讀文意費解如謎，文末則嚴斥Greenbaum和Brill出版公司皆未克盡職責。

基本上，Allan H. Barr犀利精銳的評論十分專業，為此書求全責備而費心的指疵亦具糾繆之功，其中有些部分的確指出了作者行文疏忽或思慮欠周，有些部分則屬文獻詮釋之角度不同所致。總體來說，Barr的書評並未攻訐作者Greenbaum的立論觀點，亦未動搖該書「陳繼儒接受史」的撰寫架構，筆者以下試由幾個視角綜觀全書為讀者帶來研究視域的啟發。

1. 文人型態與文學聲譽

Greenbaum首先詳辨西方文學批評界通曉的三個詞彙：fame、renown與celebrity之意涵，前二者具有政治聚焦力與倫理定位，意指某人的成就或功績，擁有一個在史傳長廊裡光輝不朽的烙印。後者則轉向廣泛的接受群體，並指涉語言對應出來的複雜社會條件，celebrity在晚明經濟發達、商業躍進、傳播流暢的變遷社會下應運而生，類似歐洲十九世紀該詞彙興起的狀況，擁有市場價值的連結。作者細忖celebrity所植根的商業文化基礎，與中國傳統的史傳名聲作對照，為陳繼儒的傳記研究作一張本，陳氏享有新興的celebrity，突破傳統fame與renown的範圍，擁有具階層跨越性的接受群體網絡：官員、鄉紳、商賈、名流、土著酋長、酒樓茶館老闆、糕餅師父、文盲……，尋繹聲譽本質的視角，使本書在理解陳氏一生軌跡時，更有著力點。

第一章考察早歲生涯。陳氏與董其昌、莫是龍、王世貞等人的友誼，以及在王錫爵、范允臨家擔任私塾，為早期榮顯與建立人格的重要因素。第二

次應試失敗後，28歲的他以焚燒儒服作為謝絕官職的儀式，開啓迥異於傳統文人的生涯。作者由陳氏性格、家庭背景、教育環境、惡化政治等面向，揣摩此一儀式性舉動，表徵退離的自我價值，並努力營造社會接受他的氛圍。焚燒儒服若代表違背禮法，那麼隱居於華亭附近的小崑山，靈感可能取自對阮籍、嵇康人生情態的傾慕，闢築一個與魏晉名士相連結的遁世桃源。然而具有新社會型態與經濟關係的江南，並不適合複現一個名流隱居的歷史情境，與僧道交遊而成為「市隱山人」的陳繼儒，並未疏離於地方事務：動員人力修築建物，為饑民賑災請願，集資覓地重建頽圯寺廟，或為公共建築獻詞，或為名流撰寫墓銘。小崑山北麓的隱居，從未真正切斷與外在世界的聯繫，他建造了一個引典於陸機的「婉孌草堂」，足以活絡其悉心經營的江南社交圈，賦予魏晉名流隱居的新意義與型式。陳繼儒稱病謝絕薦舉入仕，亦婉拒進入政治標幟性的東林書院，雖揚棄書院背後強大同盟力量所可能給予出版鏈結上的財務奧援，他卻創造一條與佛道僧徒文化名流強固的鎖鍊。第二章處理的便是陳繼儒如何藉由山中隱居與佛道交遊的關係，形塑一個公眾形象，利於其參與地方事務或拒斥政治召喚。

第四章考察陳繼儒獲得文化聲譽後的社會位階。陳氏以文化涵育的審美品味經營個人的隱居樂園，成為人們造訪的據點，又從一位被訪者逐漸成為盛名獲邀的出訪者。論及陳氏之死及其傳說，作者比對部分細節不免誇張或杜撰的諸種文獻，藉以探討陳氏人格如何連結公眾人格。饒有興味的是，如同許多明人撰寫「自祭文」一樣，陳氏亦曾自撰死亡啟事：〈空青先生墓誌銘〉，作者藉此推想陳氏死亡逼近的臨終心境，著墨於尾段的幻想情節，末句「堂中有白虹一道，仰首飛指青天而去」，將一個神祕脫俗的意象長留後人心中。此文意味著陳氏一生的努力：一個出身平庸鄙賤的庶子，透過靈活的文學手腕，轉型為社會名流，自我提昇至一個文化權貴的高度，這是近代中國一種新興的文人型態，陳氏建構了一個脫逸傳統軌跡的新世界。

2. 商業出版與大眾文化

商業發達的晚明已邁入印刷出版專業化、印物種類多樣化、銷售市場普及化、閱讀受眾廣泛化的時期，作者以《明史》本傳為引線，特別就陳繼儒「遠近競相購寫，徵請詩文者無虛日」的文意勾勒出文學書寫背後存在一個市場交易的曖昧世界。本書第三章探討陳繼儒，既是詩文雜著的作者，又是參

與印刷流程的計畫編輯，也是審訂校注他人著述的讀者，以及與人配合編撰的共同作者，終其一生，他扮演由書籍生產者到消費者的多重角色，並發展出多樣化的閱讀市場，歷經一個逐步被授與文化權柄的過程。

接著陳繼儒的兩類書寫：第五章的「傳記」與第六章的「小品」。隱士身分的陳氏以職業作家身分入世，由《陳眉公集》多達八卷的傳記作品如：題敘、碑記、祭文、墓誌、壽序、誄、行狀等可見一斑。這些接受委任的寫作有兩個面向值得注意：其一，陳氏擁有傳記作家不可忽視的技巧，在大量傳記樣式需求下的成就如何？其二，所有傳記皆可視為自傳，評贊他人一生的陳氏是否也顯現了文人品格的自我建構？德高望重者之外，他也為社會位階與處境低落的商人、一般男女作傳，陳氏的傳記語言隱藏在傳記文本裡自塑一種寫作人格，賦予道德仲裁者寬容與理解。陳氏開闢一些當代的議題如慈善行為、儉樸個性等，以利扭轉傳主的頹勢，透過書寫的設計為傳主努力爭取家族榮耀，締造低位階卻贏得褒揚的人格典範，成功地連結史傳不朽的傳統，這恰也是陳氏個人的願想。特定人士委託的「傳記」面向小眾市場，第六章討論的「小品」則開闢了大眾市場。傳記書寫中的陳氏以史家口吻論贊，罕現個人面貌，小品書寫中的他，總是顯出一種活力充沛的人格，自我再現為別具鑑賞品味的高手。小品結集成具有行銷價值與商品意義的書籍，將蒔花、茶道、旅遊等文人的審美生活，出之以人生慧語而抓緊讀者口味，擁有獨特品味的陳繼儒，以小品書寫成為商業市場主題編輯的美學權威。

文化生成是一個社會實踐的過程，大眾文化的意義並不純然在文本裡，所有扮演文化角色的話語和文本，需在社會體系的關聯中方得以傳播。陳繼儒機敏地感知江南印刷、運輸與市場行銷活絡的局面，焚燒儒服看似退隱的作風，恰好提供他一個更自由的身段，更新傳統「藏諸名山」的不朽觀，以迎合大眾口味的前提進行創作。作者將陳繼儒文學置於商品文化脈絡下來理解，以晚明迄今一再出版的《小窗幽記》為例，雖然該書著作權歸屬是一大懸案（作者對此問題曾細作考辨），確是陳氏榮名卓著的一部遺產，晚明以「小窗」為名的另外四部書亦與陳氏姓名連結，《小窗幽記》甚至可視為陳繼儒的轉喻。此書一度沈寂，到1990年代中國社會結構改變與休閒時間鬆綁後又再度盛行，此書與糾纏不清的《醉古堂劍掃》不斷再印，該書的排架位置，已從文學評論的場域滑向通俗閱讀的領地。四百年來陳繼儒引發爭議

的隱居恰好成爲一種魅力，誠然遁入山中與僧道游談的「雲間鶴」形象不被鼓勵，卻可能提昇陳氏爲一位足以帶領現代讀者穿越挫敗世界的古代智者，《小窗幽記》有益於遍及校園、企業界、一般職場、政治圈的廣大讀者群，這可由兩岸三地出現許多節錄本、重編本、白話本、卡通繪本的現象見出端倪，此書成爲新世紀讀者的心靈伴侶。

3. 正、反兩讀的接受史

文本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後則有待閱讀，每個文本並不如水晶般透明，話語的模糊性引發讀者與文本間的交流與詮釋，讀者只會根據局部情勢接受文本的意義，作品有獨立於作者及所宣示意圖之外的客觀身分，作者主體性一旦被擱置，意味著文本將被批評家接管，本書後三分之一篇幅便是以時代爲序的陳繼儒接受史。第七章探討明代中葉興起之山人風潮中的陳繼儒形象，作者闡析文獻紀錄的多幅畫像，這些視覺材料呈現了陳氏部分的形體想像：或虛弱，或慷慨寬厚，或儒士，或道徒，或文學家，或社群要員。戲曲作品則多強調眉公文化地位的崇高。陳氏大量的文學創作擴及書畫譜錄與醫學讀物，以廣告行銷方式吸引更多讀者，或盜版，或託名的偽作，與這些作品連結的身分可能是創作者、編輯者、校注者、審訂者、掛名者等，眉公名聲廣被，以致身故後其名號仍是票房保證：不僅印刷讀物的作者姓名，市井茶館懸掛的畫像，廣及飲食器具、豆糕甜糖、絲棉織品的眉公品牌，文學家、藝術家、出版權威、美學專家集於一身的陳繼儒，在晚明清初立於一個十分榮顯的位置。

第八章考察清中葉到晚清陳繼儒於正史引發的政治思維，包括著作置於禁燬書目的爭議。因爲夾雜了王朝覆滅的遺恨，清初已出現負面聲浪，如顧炎武、朱彝尊等遺民，對仕途退隱的陳繼儒大加抨擊：獨善其身卻無視王朝淪亡，由文學成就轉爲道德抉擇的論辯，Greenbaum 認爲這是清初漢人因身世感受而興起的「指桑罵槐」。清代前期官方對陳繼儒確實不懷好意，陳著《建州考》、《捷錄》等書曾被羅織異端思想而一度被禁，顧、朱的遺民觀點具現在清中葉蔣士銓的《臨川夢》，將陳氏塑造成一個欲以「眉公糕」媲美「東坡肉」，或以「眉公馬桶」媲美「李斯狗枷」的無行文人。同樣都是日常用物品牌的形象來源，清中葉的蔣氏封給陳繼儒「隱奸」稱號，晚明王世貞封爲「山中宰相」，一反讀一正讀，實有天壤之別。

蔣士銓傳奇對陳繼儒辛辣的形象塑造是攻擊浪潮壓軸之作，此後則不再如此嚴斥，如毛祥麟、陳田等人將政治攻訐轉成歷史評論，持平地綜觀陳氏一生作為。《明史》本傳的陳繼儒形象正面，與具有文藝才華的高士倪瓚、沈周一同排序歸入〈隱逸傳〉，方志亦大致順此論調。清代的私家批評，總是涉入攸關王朝命運的政治因素，清亡後，對陳氏的評論同樣不脫於此，不同的是，過去被視為衰頹毀滅象徵的晚明作品，民初反成爲一種新生的力量。第九章聚焦在1930以及1990兩個高度關注晚明小品的年代，首先探究民初的文學運動，林語堂、周作人等發現晚明小品能爲新時代注入美學價值，給予陳氏一個新舞臺。拜賜於印刷技術的進步，陳氏作品再版有兩類：一是完整作品置於大型叢書如《叢書集成》，二是個人序記等單篇被選入小型選集如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。此時的陳繼儒已非明清論述中的「隱士」，而回歸爲一位文學家。

當代對陳繼儒的評論約有三方面：其一、文學史家或文選編者主張陳氏是一位意涵豐富而有價值的文學家。其二、大陸評論家多援引社會主義觀點，對遁入山中的「雲間鶴」帶有譴責意味，認為陳氏反社會的隱居模式不值效法。其三、臺港或海外學者，對陳氏的隱逸文學有豐富的理解，或認為陳氏天生具有一種恬淡退隱而不失優雅的人格風範；或發現陳氏曾寫信給宦官魏忠賢，亦參與方志編纂，並未完全脫離世務；或認為陳氏是因為痘瘡臉容而逃離官職生涯，但此說啓人疑竇。總之，四百年來陳繼儒及其文本已成爲公共論壇，本書作者盡力挖掘真相，並刺探後代「各取所需」的同情揀擇、局部改裝與誤讀扭變等虛構性意圖，使傳主自己、閱讀客體與書寫行爲三者相互滲透，把捉歷史洪流所賦予的重重疊影與迥然相異的聲音，建構一個多影多聲相互競起的對話場域。

傳統文人的聲譽總要透過書寫紀錄被定義，爲理解陳繼儒聲譽的作用方式，Greenbaum由正史的分類位置，探看方志的頌揚角度，俯聽墓碑銘記的書寫語調，描畫虛構文本的人格形象，使陳氏在文化巨變中成爲一個迷人的焦點。作爲晚明物質文化的一個客體，他積極扮演文化權貴的角色，又具備迎合市場的職業作家特性，在廣告行銷中成爲一個社會流布的偶像，眉公品牌被廣泛運用於日常用品。陳繼儒擁有敏銳的感知與手腕，從未倦於喚醒

讀者與出版商，他接受絡繹請託的各類書籍產製工作：編輯、校注、審訂，甚至掛名，由其名聲廣布於大眾口耳間，從中締造個人身價並積累財富。他親身參與了十七世紀萌發的城市文明，並見證了晚明商業出版為中國開啓的現代化道路。作者以為，涉入眉公名號的印刷品成為中國廣告業發展史的一環，儘管未達李杜詩人的文化識別高度，亦不如奧運金牌選手李寧般家喻戶曉，而現代的眉公名聲似乎不比他死後任一時期還沈寂，輻射模式改變了中國歷史名聲的傳播特性。一位本應青史流芳的文人，連結到二十世紀末的消費網絡，那些曖昧隱微又模稜兩可的小品格言，提供著非文學的理解意涵，成為現代職場亟於古老哲學中尋找的「處世良方」，出版商以小品文學、生活美學、人生哲學、經營管理學、通俗漫畫等多樣面貌異質化地鏈結，將「陳繼儒」轉換成一個生機勃勃且持續擴大影響範圍的「商品」，原本屬於文人書齋桌案的小眾書冊，搖身一變而成為讀者共鳴的普世讀本，與堂皇古籍《道德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論語》並列於櫥窗中。透過本書作者穿針引線的帶領，四百年來的陳繼儒已由一隻展翅飛翔的「雲間鶴」，幻化成一幢文化魅影，他無疑是一則多重身分的寓言，是一則中國文人的神話。

作者游移於道德莊重的儒家仕進傳統、清高脫俗的佛道退隱氣息，以及新興廣告行銷的商業氛圍，以靈活細密的文思詳辨相關的語彙意涵，描畫一個歷時長久、矛盾糾葛、複雜多變甚至略帶嬉遊況味的文人形象，在紮實文獻解讀下，發揮豐富的想像力，建立一個足以理解陳繼儒在中國文化史特殊定位的穩固架構，使讀者充滿閱讀興味。本書揭示了文學商品化的一種研究路向：精英階層的書寫文本在商業傳播下如何成為普羅大眾的流行讀本？廣告行銷的接榫點何在？晚明以降，城市活躍的文人階層在適應新的社會變局下，其生存之道及活動軌跡究竟為何？本書提供了一個研究個案的具體展示，激發吾人對相關論題作進一步探思。